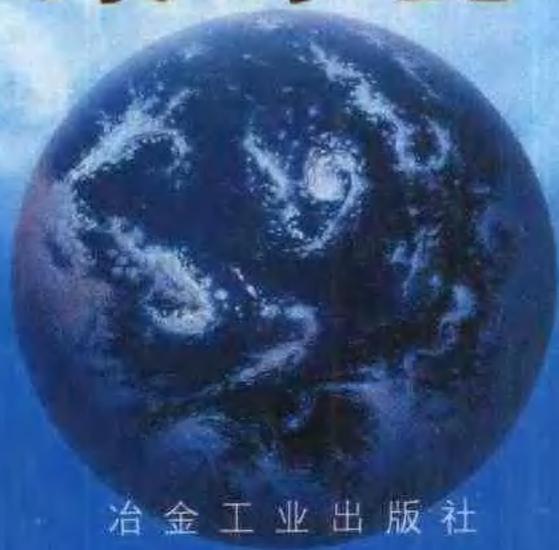


J U E C E H U A N J I N G L U N

杨海滨 著

决策环境论



冶金工业出版社

4
b

F/1

575

决策环境论

杨海滨 著



A0945886

北京
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0

内 容 提 要

决策是一门古老的科学,大到国际性组织、一个国家,小到每个人都与决策紧密相连。因此本书研究的内容有着广泛的适用性。任何人作出决策都不是与世隔绝的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与其所处的环境紧密联系在一起,对环境把握水平的高低,就是决策水平的高低。因此,研究决策者与决策环境的关系问题是决策科学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方面,这也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本书主要论述了决策环境的定义、类型与特征;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分析决策环境;以及如何有效地适应、利用和改造决策环境。本书对管理者在决策中把握各种人文社会环境、避免决策失误可起到帮助、指导作用。

本书可供管理人员、决策人员等广大读者参考、学习使用,也可作为大专院校有关管理专业师生的教学参考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决策环境论/杨海滨著. —北京:冶金工业出版社, 2000. 12

ISBN 7-5024-2710-4

I. 决… II. 杨… III. 决策学
IV. C93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860 号

出版人 卿启云(北京沙滩嵩祝院北巷 39 号,邮编 100009)

责任编辑 易文君 美术编辑 李 心 责任校对 王永欣 责任印制 牛晓波

北京源海印刷厂印刷;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850mm×1168mm 1/32; 5 印张; 135 千字; 154 页; 1—2000 册

12.00 元

冶金工业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010)64044283 传真:(010)64027893

冶金书店 地址:北京东四西大街 46 号(100711) 电话:(010)65289081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第一章 环 境

决策问题总是在一定的环境内产生、发展的,作任何决策都不能脱离环境。按照毛泽东的话来说,无论什么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生活于(实践于)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环境状况和决策者以及决策过程相互之间形成各种联系和影响。特别是现代决策中,各种外部影响的强度和广度大大增加和拓展,使决策更加复杂化。因此,要科学地认识和作出决策,必须研究决策的环境问题,在决策与环境的和谐中取得决策的最大效果。

一、环境的概念

所谓环境,通常的理解就是指“周围的情况和条件”(《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490页)现代社会,环境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社会各种活动的基本条件

无论什么样的环境,都有两个共同的特征:一是客观性。环境是对主体活动产生影响和制约的客观条件,对任何主体,都是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现实。主体依赖于环境而存在,环境为主体活动提供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任何违背这种现实的活动都不能达到目的。二是开放性。任何组织和个人,都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的作用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个角落。每个人都属于某个环境或某几个环境中的一个因素。别人的情况和条件对你产生影响,而你的状况又成为别人的情况和条件。因此,人类活动都要以与环境的输入输出为条件,与环境不断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流。

对于人而言,所谓环境,“无非是这样一个过程和体系:作为环境主体的人,从外部诸条件(地理、客观环境)中抽出对自己有意义的诸条件,同它们发生关系(行为环境)。”(竹内郁郎:《大众传播社会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第211页。)环境除了上述两个特征外,还应有两个要求:一是环境的可感性。这是指

对人的活动直接或间接起作用的情况和条件。有些情况和条件虽然在人的周围,但它对人的活动不起作用,因而说它是环境没有什么意义。二是可测度性。所谓可测度,首先是人在心理上对环境作出反应和评价,这反映着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互动是认同,还是适应,还是矛盾?等等。其次是主体对周围情况与条件想做什么。根据环境的状况,结合主体的认识能够对环境采取因应行为。

二、环境的主体

在我们所说的环境中,主体是人类。当然,除了人类世界而外,还存在着动物世界。这两种世界虽然都存在于地球这个环境中,但是,两者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从一切生物的生理、心理机能的结构系统即生理、心理与周围世界的形成的相关机能和作用关系而言,动物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是特定化、固定化、封闭化的,而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是非特定化、特定化、开放化的。”(王永昌:《走向人的世界》,中国工人出版社1991年8月第1版,第95页)这些方面差别的集中体现首先是人类具有主体性。动物对于它们的环境只能是本能地适应,只能在环境中按自己的自然本能行事,不能留下一点它的意志的痕迹,因而动物在与其环境的关系中不具有主体地位。当然动物也有群体,有自己的沟通方式,并形成自己的“社会”。但即便如此,这种“社会”仍然是作为生命存在物的生存和发展形成的,仍然是本能的生存形态。由于它们是无意识的,因而丝毫不会对其所处的环境有什么“企图”。而在人类世界中,环境对人类来讲只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这样,人就使自己从他们处的环境中站立起来,划分出来,从而具有主体性。人的主体性意味着人成了万物的尺度,以自身的内在尺度去评估周围环境。在人类来看,世界不会满足人,人决心以自己的行动来改变世界,以自己的意志有目的地控制环境,这就是人的理智、选择、创造和自由。所以,恩格斯指出:“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们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

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后的本质的区别”。(《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这种本质的区别使人类能够把“自然存在物”变为“为我存在物”,从现实存在中寻找无数种可能性,把符合人类需要而现实中又不存在的东西创造出来。更由于人类创造了劳动工具,使人类与环境之间的物质、信息、能量交换的广度和深度大大拓展和延伸,使得人类进行创造的方式愈来愈多样,领域愈来愈广阔。可以说,人类在不知道什么是决策科学之前,就已经在决策,已经在自发地处理着决策与环境的关系问题。

人类世界与动物世界的区别,同时也是造成决策与环境关系相当复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性。

人类的社会性是由人类劳动所决定的,这也是人类的社会性与动物的群聚性的本质区别所在。由于劳动分工的存在,就产生了协作的需求,进而发生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这种交往首先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发生,是经济的交往,并从中建立了生产关系。在此基础上产生知识、信仰、道德、法律、艺术、习俗、精神状态、价值观念等交往与沟通,并形成与生产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所以社会是人们交往作用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人创造了社会,也创造了环境。当然,也要看到,环境也会创造人。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总要受到既往历史的限制。各个时代的更替,每个时代都利用了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所有条件,包括正面的和负面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的活动就不能不受到历史和社会的制约。人们可以进行创造,但不可以随心所欲;人们可以是自由的,但是又只能是一定意义上的自由而不是完全的自由。

我们所研究的环境问题,是“人类环境”系统。它包括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事物,也包括处在社会关系中的人。在“人类环境”系统中,一般来说,环境是指“以人类为中心的空间及其中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生活和发展的各种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总体”(《行政学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513页。)环境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中心事物的属性、内容发生变化,环境的内涵和外延也就随之改变。在人与环境的关系上,环境的属性、内容

也是根据人的需要而有所变化的。比如在环境中,研究某一自然事物,我们既可以研究它的自然属性,也可以研究在它们之上所反映的人与人的关系。这样,我们就把自然事物本来固有的自然属性变成了研究自然事物的社会属性。特别是在决策中对自然事物从人的角度去考察,在对环境的客观性考察中结合着人的决策目的和进程去考察更是必不可少的,管理二重性原理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如果只是就环境而研究环境,脱离了人类这个中心,那么,这种环境对人、对决策来说都是毫无意义的。

就“人类环境”系统而言,环境是在人的活动中逐渐生成的。环境自身虽然不依赖于人而存在,但是它只有和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才能进入“人类环境”系统。而人则是在实践活动中,通过实践活动中的主体性特征,逐步了解环境的性质、人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这种认识从局部的、孤立的逐步扩展到整体的、联系的;从具体的、感性的发展到抽象的、理性的。人类对环境认识由浅入深,进而按照自己的目的去掌握它,使外部客观的环境成为人的对象性存在。环境随着人的实践而发生变化,变化了的新环境又成为人们所要认识的对象。

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

人类面临着共同的环境——自然的和社会的。当然对不同的组织和个人而言,环境又是各不相同的。有私人环境、公众环境;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组织环境、个人环境;国际环境、国内环境等。即使对于同一环境,不同的组织和个人由于其目的性不同,因而看待环境的思想方法、认识角度和程度也各不相同。所以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系统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直接或间接影响人类活动的各种情况和条件可以概括为自然的和社会的两个方面。

(一)人与自然环境

自然环境是指以人为中心的大自然,即大气圈、生物圈、水圈和岩石圈,这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人类的一切活

动都与这些圈层的相互作用有密切的关系。自然环境是以整个自然界作为自己极限的,而我们在研究决策问题时所研究的自然环境,则是以人为中心的大自然。因为自然界除了与人有联系的自然界以外,还有人类活动尚未影响到或对人类活动尚未构成影响的自然界。而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界,不仅有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有人与自然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自然环境中,以人为中心的自然界的各种因素对人类活动的影响力最大。

适宜的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创造文明的必要条件。人类的成长都带有一定的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经验,比如有热带和寒带地区;有山区和平原地区;有旱区和水区等。人们所面对的不同自然条件使人发展适合于其生存的习惯和行为。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民族、国家大多出现在自然条件比较优越的大河流域和沿海地区;都市化的过程显示,地理环境是新都市的出现和既存都市中心成长的重要因素,例如庞大的都市多位于海岸、大河流域旁或靠近自然资源的蕴藏地。文明的生成最早在东方的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两岸、中东的两河流域以及地中海边。人类生存离不开自然,是因为人类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其生存和发展要受到自然的制约。人类的生活资料取之于自然,劳动对象也是自然。自然和劳动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人类的财富。

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发展也相当重要,特别是它作为生产力的要素之劳动对象,构成了物质资料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所以列宁认为“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着生产力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8卷,第459页。)人类社会文明程度无论多高,也摆脱不了对自然环境的依赖,而且会对更加合理有效地利用自然环境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人类过去的历史中,自然条件禀赋给某些地区或某些人带来竞争优势。在当今全球竞争时代,虽然全球经济以拥有快捷的交通、高速的通讯、市场进入无障碍为特征,但人们对自然资源、地理区位上的重要性的期望事实上依然存在。我们已知的人类历史演进过程大体上是从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又转向知识社会。在农业社会里,自然资源本身就是财富的象征。在工业

社会中,依赖于能源与材料资源,以物质生产为主。所以工业社会就是把自然资源与物质生产结合起来。当然,最能体现工业社会特征的,是人们从对自然资源的操纵转向对物质生产过程的操纵。工业革命兴起,制造设备出现,资本也随之产生;并且资本从其物质形态向价值形态转化,物质生产和资本结合到了一起。到了知识社会,由于知识减少了人们对原料、劳动、时间、空间和资本的需要,因此而成为先进经济的主要资本,物质生产与知识生产结合到了一起。从农业社会(自然环境与资源)到工业社会(自然环境与资源+工业资本)到知识社会(自然环境与资源+工业资本+知识资本),不是说自然环境越来越不重要,而是说人类在利用自然环境中进入了更高的层次。在农业社会,自然环境是封闭的村庄、部落,竞争优势体现为对土地等资源占有;工业社会,自然环境扩展到区位,竞争优势在于物质资源的大量投入;而在当代知识社会,自然环境则是全球性的,知识成为竞争的最重要的资本。这不是说不需要自然环境与资源,而是人们对环境和资源选择的范围和使用的自由度更加扩大了。也不是说有了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那些传统的产业就可以抛弃了,做鞋、做食品、做衣服统统都是落后产业了。“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低技术产业这一说法,有的只是低技术公司即那些不能使用世界先进技术和惯例做法以提高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公司”。(迈克尔·E·波特:《簇群与新竞争经济学》,《经济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2期。)

更值得注意的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增长时代”到工业社会“发展时代”、到进入知识社会“可持续发展时代”,从依赖于自然环境而生存到掠夺自然环境求得发展,今天,终于又回过头来,再次关注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这不能不说自然环境对人类的重要性大大增加了,丝毫忽视不得。环境的演变受到两个因素的决定:一是自然动力,即环境变化遵循客观的自然演变规律;二是人类活动,即人类对自然演变的干预扰动。人类社会传统的发展模式是以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恶化为代价换取社会的物质文明,对自然界干扰的强度和广度扩大的结果是使全球环境状况出现恶化

趋势,对人类未来生存与发展造成威胁。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应使自然环境的演化有利于恢复、维持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和谐的关系;要调整并控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和扰动,实现人类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的协调。

自然环境不仅影响到人类的物质生活,而且会影响到人类的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处于不同自然环境中的人从生活习惯、习俗到宗教信仰等都会表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一个民族的形成,离不开三个因素: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文化的遗产。”(潘光旦:《中国人的特性》,海南出版社1998年2月第1版,第36页。)生物遗传力量应用到地理环境上便产生文化,遗传越优越,环境越良好,文化便越发达。同时环境和文化对遗传又产生选择和淘汰的影响,得法,则遗传品质越来越高;不得法,则越来越降低。在政治等方面,政治学家对地理、生态状况与政治系统的关系做过大量的研究,地缘政治学成为政治学中最为古老的分支学科之一。(严强等:《宏观政治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6月第1版。)现代地缘政治重视战略原料资源所在地所处的空间意义,宇宙空间也具有关键的意义。而且,自然环境已经被放到民族统一性、世界和地区政治的性质、工艺技术发展水平等中去考察。

由此可见,研究决策问题,必须熟悉自然环境,了解自然环境。由于人的能动作用,使自然环境变得具有属人的性质。在自然环境适合的情况下,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环境禀赋。如荷兰海运的发达,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荷兰地处欧洲中心,有发达的水运网,加上港口和荷兰人在长期航海中积累的技巧。在自然环境不利的地方,人们也会以科学地选择利用和改造自然环境的方式得到发展的机会。以色列水资源匮乏、闷热、干燥的生长环境造成了人们对食物自给自足的强烈需求,进而产生了世界上先进的灌溉设备和其他先进的农业技术。

自然环境对人类决策活动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在这里对人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作了概要的述说。但是更要看到,决策行为是人与人的行为关系,目的性和社会性是人的行为的基本

特征。以后本书中没有特殊说明时，“环境”指的都是社会环境。

(二)人与社会环境

社会环境是影响人类生活与发展的各种社会因素的总和。社会环境的组成因素很复杂,从大的构成来讲,主要有两大系统,一是人类社会系统;二是人的系统。人类社会系统主要是由以下几个方面构成的:

经济方面:包括人们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相互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经济体制、经济结构等。

政治方面:主要是指上层建筑,包括政治组织、政治制度、政体政权、领导制度、法律制度等。

文化方面:主要是指价值观念、宗教信仰、生活方式等。

科技与教育:包括科学研究能力与水平、科技体制、科技人才队伍、技术开发能力与水平、国民教育水平、教育制度、教育投资、教育手段与方法等。

民族与人口:包括民族的分布、民族关系、民族发展、人口数量与质量、人口结构、人力资源开发等

人的系统的组成,笔者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

生命方面:包括健康、营养、生存状况、寿命、自然增长率、自然死亡率等。

人格方面:包括气质、性格、兴趣、能力、观念、态度、习惯等。

人权方面:包括角色、地位、权力、利益、责任、义务等。

人的系统的三个方面,生命和人格所表现的是人的生理和精神的方面。而人权方面则比较特殊,它是联系人的系统与社会系统的中介,既与个人的生理精神能力相关,又与社会中各种要素相关。通过这个中介,把个人系统的生理与精神能力同社会系统其他要素联结起来。1776年美国在《独立宣言》中提到:“凡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能转让的权利,其中有生命、自由和幸福的追求。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类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是获被统治者的同意而产生出来的……”这就很贴切地说明了人权在人的系统与社会系统之间的作用。人权既是

个人的,又是社会的。说它是个人的,是因为它反映了个人生理和精神状态,个人有权力根据自身的状态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and 所尽的义务。人的存在有个人、群体和人类三种形式,作为活生生的有需要的人,他们一切活动及其结果最终都要还原成为个体存在形式,都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利益和需要服务的。说它是社会的,是它取决于社会所提供给它定位。正如法国一位学者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解那样:“这三个词作为价值原则,必须作出适当的解释,才具有意义。自由意味着它必须受到他人自由的限制,我的行为不能游离于社会群体之外。平等必须是法律上的平等,平等丝毫不意味着高度的统一。”(安托瓦纳·唐善:《由生物学论及伦理道德的几个问题》,《跨文化对话(一)》,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9页。)这就说明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并且对于决策者正确理解他与社会系统之间的关系、正确把握决策的目标、可能性、制约条件及对环境的利用与改造等都是适用的。

在决策活动中,主要是要研究决策与社会环境之间的作用 and 影响。因为与自然环境相比,社会环境所包含的因素多,相互关系也更为复杂,对决策者的行为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突出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社会环境的形成与运动完全是人为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产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既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又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当然,关于个人与社会的联系,也还有多方面的考察:例如意大利思想家雅科就认为人类世界确实是由人类自己创造的。怎么创造的呢?是由人类心智创造的。英国哲学家霍布斯则认为社会是由“社会契约”方式而形成的,即用契约的方式建立公共权力,使个体联结成社会。黑格尔则认为“受理性支配的私欲和热情把个体的自由意识的追求与社会利益的实现统一起来”。(桂桂华:《转型社会控

制论》，山西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第 1 版，第 94 页。）应当说，尽管这些观点与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的观点并不一致，但也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社会是由人创造的这样一种现实，揭示了人创造社会的某一个方面的原因。在决策学研究中，对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是逐步认识并深化的。从“经济人”到“社会人”，又到“决策人”、“伦理人”等，使决策的视野越来越开阔，越来越多地超越决策的技术性的规定而寻找更加符合和有利于促进人与社会的协调的关系。

第二，社会环境是智慧的环境。社会环境的形成与发展，不是上帝的安排，在其形成、发展中所包含的最为宝贵的东西是人的智慧。说人的本质力量，智慧就是它现实的、对象化的体现。在社会环境中，人们既注意事实性关系，即“是什么”，又更重视价值性关系，即“该怎样”的关系。而解决“该怎样”的问题，是人类所独有的智慧。

社会环境究竟是怎样一种智慧的环境？从社会环境构成的层次来看，按英国哲学家波普尔划分是三个世界：世界 1 是物理世界，指客观物质世界的一切物质客体及其现象，包括人体及其脑；世界 2 是主观精神世界，指人的主观意识和精神活动；世界 3 是客观知识世界，包括了一切体现在客观物体中的精神内容，如语言、文学、艺术、理论、图书、工具、房屋、汽车、飞机等。世界 1 对人类社会来说是基础，而世界 2 和世界 3 则明显是构成社会环境的方面。就世界 2 来说，意识本质上是社会的。以个人为主体的意识因社会生活和关系的错综复杂，使每个人的意识都有各自的特点。而个人意识又离不开群体意识。各种群体的社会条件、地位不同而形成各不相同的意识。这些意识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相互转化，成为思维力、创造力，直接影响社会环境中的生活方式、价值准则、社会行为等。世界 2 与世界 3 之间的相互作用更加直接。人的意识的客观表现，就是世界 3，它记录了人的精神活动的结果，是人的智慧遗传、扩散的手段。有了世界 2 和世界 3 的相互作用，使个人、群体意识在交往中融合、升华、继承和发展，成为人类的财

富。在那些被意识所反映的事物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人们可以把它们放到新的环境中看它们是否符合人的要求,如何做出合理、有效的改进。在意识所反映的事物不存在的情况下,作为人类智慧而传留下来的那些精神产品,更会引发人的深层思考,更能激发新的智慧。在社会环境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控制论专家维纳在《人有人的用处》一书中曾指出,人具有智力上的装备,使他能适应环境中的重大变化,因为人有天赋的适应环境的学习能力。在社会环境中,人们不断地实践,修正自己的观点,总结和借鉴自己的,别人的经验教训,使自己变得更加聪明。

第三,社会环境的制度性。在社会环境中,存在着具体的、内在的秩序,这种秩序以制度的方式表现出来,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这种制度性把决策者的行为通过一系列的规则、规范与社会环境联系在一起。因此,决策者是生活在制度环境中的,一定的制度环境制约着决策者的行为。决策者处在一个由准则、价值观和各种规范组成的社会框架之中,社会框架决定着哪些决策行为是合适的和可以接受的。美国管理学家巴纳德创立的社会系统(亦称社会制度)学派就是把社会各级组织看成是协作的系统。它受到社会环境这一更大的系统的各方面所制约,因此,每一个组织或系统都应有协作的愿望、共同的目标和信息联系这三个要素。

社会环境的制度性相当重要,它可以满足社会需要,可以提供社会教化,规范行为导向;可以对社会起整合作用。社会环境中的制度包括:(1)社会形态。这是在一定生产力水平上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统一,如封建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等;(2)体制。它是社会中某个方面的结构、程序和设制的总和,如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等;(3)制度。它是体制运行中表现出来的各种规则、规范的功能的总和,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制度,社会主义是其形态;市场经济体制是其结构与设制;企业制度则是其具体安排。

社会环境的三个特点对于决策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由于

社会环境是人为的环境,因而决策者的行为就应表现出超越本能的力量,最大限度地拓展自己的活动空间。特别是现代社会,环境相互联结、相互渗透。社会的世界就是人的世界,而人是一种追求和创造理想的理智动物。要揭开人的奥秘,离不开审视周围的世界;要理解周围的世界,离不开人的智慧。现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恩斯特·卡西尔指出,人有创造“理想世界”的能力,人的本质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活动。他的结论就是:“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化,可以被称作人的不断解放自身的历程。”(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1版。)决策学中有决策到底是一门科学还是一门艺术之争,不管是科学也好,艺术也好,两者都反映了人类的智慧,而智慧的本质是创造:决策与环境之间的理想与现实、必然与应然、困境与出路,无不在于创造性的发挥为之开辟道路。

第二章 中外决策环境研究与意义

决策的复杂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引起的,而环境的复杂性一方面固有的,另一方面也是因人而异的。不同的人对同样的环境会有不同的认识,对环境的利用也会有不同的方式方法。“今天不同于昨天,明天也不会等同于今天,但是,今天是我们昨天的全部情况的结晶,而且明天的情况也将是如此。管理学者从历史上可以吸取许多经验教训,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把研究过去作为研究管理的入门。”(丹尼尔·A·雷恩:《管理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4页。)这对研究决策环境也是适用的。

一、中国古代决策环境思想

研究中国古代圣贤对决策环境问题的看法和运用方式很重要,因为作为人类文化的遗产,中国古代经典中的思想具有相当高的水平,是人类思想宝库中的重要宝藏。另一方面,中国古代的思想是古老东方文明的代表之一,与西方文化相比有很多大相径庭之处,两相映照,相信会给人以多方面的启示。从决策理论与实践来看,人们常把现代决策看成是西方工业文明的产物,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像日本、韩国及亚洲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就其决策思想与实践来看,更鲜明地带有东方文化的色彩,并且也取得了成功。而这些反映东方文化的思想与实践,有相当大的部分起源于中国。“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战败后的日本经济迅速复兴,中国经典的影响力,功应居首。”(伊藤肇:《东方人的经营智慧》,光明日报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1页。)

人类决策活动自古就有,因此对环境的认识和利用也与之俱来。当然,活动的存在不代表作为一门科学的存在。但是当我们对这些认识和活动进行梳理后,仍然能得到对于指导现代决策与

环境关系的借鉴和启发。翻开人类历史,王者夺取天下,智者功成名就,无不是对当时的历史条件作了最为有效的运用。

笔者认为中国古代对决策环境的认识和运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环境要素论

环境要素是环境包含的基本内容及有机构成。考虑决策环境问题,就是对环境要素进行适当的抉择。决策环境的要素一般有若干相对不变的重要的方面,最概括的说法比如三大要素:天时、地利、人和。但是环境要素在不同的条件下相互作用以后,就会有不同状况,其作用和影响就会有不同,因而又可以说其要素是不断变化的。由此而产生多种多样的要素组合,产生出千变万化的效果。那么,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环境要素是如何归纳与认识的呢?

《孙子兵法》中提出了“五事七计”(《孙子·始计》)。“五事”就是道、天、地、将、法。

“道”:决策是否反映了民意,符合大多数人的愿望。实际上就是决策的指导思想是否被人们理解和接受。顺民意、符合世事潮流,则“令民与上同意,故也可与之死,可以与之生,而不畏危。”

“天”:“阴阳、寒暑、时制也。”意指客观条件是什么状况,这里既是讲的自然条件的情况,加以引申也可以理解为对整个宏观环境的把握。

“地”:“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这是决策执行中短兵相接时面对的直接环境状况,也可以理解为对微观环境的应对。

“将”:决策是由人作出的,特别是处在一定层次上的决策者,其应具备的素质对决策质量关系重大。因而作为“将”必须兼备“智、信、仁、勇、严”。

“法”: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组织和制度环境也是决策成事的重要因素。“曲制、官道、主用也”。不仅组织内部要有分工原则、管理制度和规划,也要知晓组织外部社会的各种规则。

“五事”作为决策环境的要素极为重要。在“道、天、地、将、法”每字前如能“得”字相加,则占尽优势;反之,在每字前都冠以“失”